

# 從新自由主義到後物質主義 ——香港農業空間的媒體論述轉向

● 黃佩映

**摘要：**大眾媒體往往被視為建構社會圖景和集體主體性的場域。本文通過對1982至2018年間有關香港農業的媒體論述，包括報章、電視節目和另類媒體中的報導進行文本分析，並輔以必要的訪談，試圖考察在新自由主義治理的環境中，另類的主體論述如何在農業空間中生成，以及這種論述在多大程度上挑戰了資本主義霸權。論述分析的結果表明，香港的農業論述在2010年以後明顯受到源於都市社區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而後物質主義通過提倡建立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空間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公共論述對香港農業的社會想像，儘管其論述自身並沒有形成內部一致的價值聚合。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後物質主義 媒體論述 香港農業空間 另類主體性

隨着上世紀70年代城市化浪潮席卷香港新界的鄉村地區，香港農業的生存空間大幅萎縮<sup>①</sup>。官方資料顯示，2018年，香港約有4,300位農夫以及約2,500個農場，其產出的蔬菜量僅佔本地消耗量的1.8%<sup>②</sup>。雖然跟市區一樣，農業空間亦要面對高地價政策或者所謂「地產霸權」的衝擊<sup>③</sup>，但是在不少香港市民眼中，新界的鄉村不過是香港的「田園綠帶」<sup>④</sup>。相應地，自農業式微以來，只有零星媒體報導關注本地農業。然而，2009年「菜園村事件」發生之後<sup>⑤</sup>，關於農業的論述大大增加，主流媒體給予香港農業與其耕作規模相比顯然不相稱的較高關注度。

2014年上映的商業電影《竊聽風雲3》就折射了近年來香港社會主流論述對農業空間的認知和想像發生的明顯變化。故事聚焦香港鄉郊地區的土地買

\* 本研究改自筆者博士論文的部分章節，在此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李立峯教授對論文的指導。同時，感謝學友卞冬磊、袁光鋒、王薇對中文文稿提出的修改意見。

賣，將新界鄉村中洋溢着父權色彩的宗族制度以及紛亂的土地管治狀況暴露無遺。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最後，吳彥祖扮演的電腦黑客角色選擇留在新界開墾農地。而這一結局恰恰反映了香港社會對農業空間認知變化背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少數的香港城市青年透過菜園村事件了解鄉村議題後，選擇留守鄉村從事耕作，或者參與和本土農業復興有關的工作。這些農業青年結成若干個小型的農業社區組織，積極向公眾傳達其理念，甚至藉此反思作為香港資本主義霸權核心論述的「中環價值」<sup>⑥</sup>。就行動方式而言，農業青年的實踐，出現了夏循祥在考察香港灣仔利東街居民反對市區重建計劃的社區行動時提出的運動邏輯，即當地居民與草根組織、表演者和專業人士實現聯動，通過自主拍攝的影像作品、藝術展覽等吸引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形成一股具有「生產性和建設性的合力」<sup>⑦</sup>。事實上，菜園村事件之所以得到眾多主流媒體的關注，一股重要的推力就在於民間紀錄片團隊將其製作的影像放到網上傳播<sup>⑧</sup>。活躍的農業群體除了通過主流媒體和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 引起社會關注<sup>⑨</sup>，亦相繼出版了多本與香港農業相關的書籍，內容囊括了農夫的故事、農業的歷史與現狀分析，還有實際的操作指導<sup>⑩</sup>。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質疑有關鄉村生活方式的浪漫化論述。郭恩慈就表明這種反對發展主義的追求最後可能落入「社群生活的拜物主義」<sup>⑪</sup>。青年在國際大都市的環境中選擇務農，到底只是在不反對霸權的前提下踐行一種懷舊的、烏托邦式的想像，還是有效地建構了一套反資本主義霸權的主體論述？事實上，基於對香港農業報導的分析以及與農業群體的訪談，筆者發現甚少人出於對昔日鄉村社群生活的嚮往而投身農業實踐。可以說，和可溯源至上世紀80年代末「愛鄉返土」並延續至今的台灣農藝復興運動類似<sup>⑫</sup>，香港的農業群體身份各異，各有其表述與立場。整體看來，他們的訴求相當複雜和多元，而且他們未必是新界的村民或者農業的直接生產者，而是以全職或者兼職身份從事農耕或者與農業相關的公眾教育。此外，與始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日本有機農業運動類似<sup>⑬</sup>，香港的新式農業實踐植根於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而且與農業之外的領域或者社會議題如環保、生活方式、城市保育等息息相關。有些參與者為了綠色的健康生活創辦農場，譬如早在1980年代末建立的「綠田園」；有些參與者來自一些環保組織，如「長春社」；有些人本來就生於農家，在市區求學或者打拼過後回到新界鄉村，並且致力於提高農業技術和產量<sup>⑭</sup>。

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論述不僅折射社會變遷的過程，更是各種社會力量爭奪意義建構的舞台<sup>⑮</sup>。本文選擇農業——一個在香港的現實經濟層面相對次要的領域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更多是出於一種理論層面的探索，即理解一種不止求「破」、更是求「立」的反霸權論述如何生成。階級鬥爭這類傳統的反霸權社會行動隨着後工業社會的到來而遭遇冷落，社會分層日趨多樣令政治陣營失去了明確的階級基礎構連<sup>⑯</sup>，反霸權行動亦轉入強調價值觀念與情感的「新社會運動」方向<sup>⑰</sup>，2006和2007年間香港的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社區行動便是一例<sup>⑱</sup>，而以菜園村事件為源頭的關於農業空間的保育論述，也被認為是城市保育運動的延伸<sup>⑲</sup>。跟以往關於反霸權行動的研究重點分析

動員方式不同，本文着眼於更長遠的論述變遷，並且以力量薄弱但持續較長時間的農業論述為例，從中反思一種反霸權論述所建基的價值觀念何以能夠建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當相對邊緣的農業議題得到了不相稱的關注度，這一現象自身已經表明了社會價值觀念的某種轉變，即愈來愈多人期待建立有別於當下體制的另類生活方式。由此可見，這一相對次要的議題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更為深遠的價值與意義。具體而言，本文將通過考察上世紀80年代以降香港主流媒體以及2010年後的另類媒體有關香港農業的論述，探討農業空間中不同立場的參與群體之間的論述競爭，進而反思另類的聲音在多大程度上挑戰了資本主義霸權的論述。

## 一 新自由主義、後物質主義與主體的重構

### (一) 論述、權力與新自由主義治理

上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通過媒體專欄傳播到香港<sup>20</sup>。其時，世界多地已然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sup>21</sup>。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傳統農耕經濟領域的小農轉型成為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運作邏輯的「企業家」，譬如芬蘭的農業政策就有意識地促進這一主體的改變<sup>22</sup>，而這一時期的港英政府對待農業的態度亦有所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港英政府通過開展農業合作運動這一經濟配置手段，維持新界農業生產秩序、農村基層的有效組織乃至社會的穩定，然而到了70年代末，合作社轉變為「市場代理人」<sup>23</sup>，反過來壓迫農戶。不過在農業捲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同時，傳統的農民群體亦謀求另類的發展道路<sup>24</sup>。且不說這些反抗新自由主義治理方案的行動究竟有甚麼成效，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譬如，1999年法國的農民聯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和奶農因反對美國將注射了生產激素的牛肉進口到歐洲，以及不滿美國對羊奶芝士的進口稅收方案，搗毀了一家在建的麥當勞餐廳，剛開始法國媒體將這一行動描述為暴力的非法行為，然而當農民組織的行動者被捕後，法國媒體轉而賦予這些農民行動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象徵意義，法國的農民群體因而成了對抗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自治文化傳統的代表<sup>25</sup>。

然而，本文無意如傳統的農民學那般深究農民作為一個從屬階級如何反抗農業資本主義和權力治理機器<sup>26</sup>，畢竟從屬階級的身份並不必然意味農民否認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sup>27</sup>。本文並沒有將農民視為一個有清晰邊界的身份群體，反之，就如上述所言，香港的行動者不斷重構農夫或者農民的身份內涵。在香港的案例中，農業群體正是通過展示農夫可以如何生活、農業空間可以如何使用，打破固有的意義/知識生產方式，從而獲得反霸權的主體性，挑戰資本主義霸權。

在進行經驗探討之前，我們有必要扼要說明論述(discourse)與權力的關係，即論述如何具有塑造主體的權力，它是如何成為霸權以及反霸權的手

段？基於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生產知識一說，學界一般認同所謂的「論述」乃是由具體歷史脈絡中的權力關係所建構<sup>29</sup>。除了建構現實，論述實踐亦推動了社會的知識、信念變遷<sup>30</sup>，以及影響個體的社會認知<sup>31</sup>。受福柯影響，費爾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大抵認為論述通過選擇的機制布展其權力，如通過語態、主題、措辭等的選擇來進行區隔或者構序<sup>32</sup>。而新自由主義的權力之網帶來了何種論述實踐，亦是這一脈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福柯就曾表明，新自由主義將個體視為「經濟人」或者「自我企業家」<sup>33</sup>，即個體被要求將自身視作資本、生產者和收入的來源。如果說在英美等國家，其悠久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利於催生這種觀念，那麼在其他後發的地區，媒體論述就扮演了更突出的引導者角色。譬如蘇聯解體後，積極的「經濟人」論述實踐在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sup>34</sup>。而香港政府在1990年代便積極採用企業型都市的論述，如推動香港的國際都會品牌形象計劃<sup>35</sup>。許寶強就指出香港在90年代末經濟衰退以來，主流媒體論述將人視為「人力資源」，大力鼓吹培育市民的「經濟素質」，主流媒體除了吹捧商業社會的成功人士外，在政府削減福利保障時，還拋出「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養懶人」這種污名化的措辭<sup>36</sup>。那麼當這種宣揚「中環價值」的「自我企業家」主體論述成了主流的社會觀念時，香港的主流媒體會以何種方式論述農業群體？會因其不符合香港社會的商業需求而將其完全撇除，抑或將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加於其上？

## (二) 後物質主義價值與主體的重構

從理論上來說，抗衡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尚有出路。福柯雖則強調權力對行為的引導，但亦曾探討建立自我的可能性，而且他將希望寄予經驗的層面<sup>37</sup>。換言之，若要抗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論述對生活經驗的滲透，用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話來說，行動者需要用「新的規則和新的解釋」去改變人們經驗世界中的所謂「感覺結構」<sup>38</sup>。香港在上世紀末經歷金融風暴以後，新自由主義那套努力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論述遭受了挑戰<sup>39</sup>。許寶強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香港社會已經有人開展了小型的經濟生活變革實驗——提倡非資本主義的「社群經濟」，鼓勵形成可持續的交換市場，並且舉辦社群活動，強調社群關懷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sup>40</sup>。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的主流媒體是否給予這些另類經濟生活方式以發聲的空間？如有，這些另類生活如何被論述？值得注意的是，與許寶強所討論的社群經濟實踐不同，香港農業空間的活動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事實上，農業論述之所以在公共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離不開菜園村事件後少數青年人留守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以及農業論述的傳播。為了更具體地探討農業空間中存在的主體論述，本文嘗試從城市保育運動背後折射出來的觀念轉變開始談起。

2011年一項關於香港社會價值變遷的研究指出，青年人日益支持「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價值、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體制<sup>41</sup>。亦有學者在另類媒體上發文表示，農業實踐的社會背景是香港進入了後物質主義的時代，

「明顯地，香港走進了一個新時代，是後物質主義。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sup>④</sup>。更重要的是，有實證研究表明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香港得到愈來愈多的討論。李立峯與鄧鍵一發現，儘管「後物質主義」是一個學術概念，卻在香港的大眾媒體上頻頻出現<sup>⑤</sup>，而李立峯亦通過調查指出這一代青年人日益傾向於後物質主義價值<sup>⑥</sup>。有鑒於此，本文嘗試用「後物質主義」這一術語來指稱農業空間出現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選擇這一詞彙並非因為農業群體自身將其作為口號，而是基於整個公共輿論環境對類似的實踐行動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的概括。在此意義上，如何命名農業空間的主體論述並不重要，「後物質主義」的說法只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或者一個比泛泛而談的「另類」價值更為具體細緻的方向。

與「經濟人」論述假定的經濟理性相反，「後物質主義」概念的提出者英高赫 (Ronald Inglehart) 認為後物質主義強調生活品質、歸屬感與個人的終極發展。他的學說建立在物質充裕、經濟安全、教育擴張的後工業社會之上，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可能會因為浸淫在與上一代人不同的生活經驗中而更多表現出後物質主義取向的價值觀念，比如追求美麗的城市/自然、更有人情味的社會、在工作和社區生活中有更多發言權、社會尊重人的自由和理想等<sup>⑦</sup>。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社會環境與英高赫學說的前提有所不同。雖然香港在1980年代已邁向後工業社會，但是90年代以來經濟開始衰退，而且知識經濟發展有限，以至於有學者形容這是一個「沒有憧憬的後工業主義」社會<sup>⑧</sup>。換言之，香港的青年人置身於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這一說法亦呼應了李立峯認為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取向並非建基於物質層面上安定的個人生活，他進一步指出，以往關於後物質主義的研究側重考察人們對社會發展的整體看法，而非關注個體在自身生活層面所持有的觀念，而實際上，人們作為獨立的個體，可以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持有後物質主義取向的社會發展觀念<sup>⑨</sup>。

需要補充的是，杰克曼 (Robert W. Jackman) 與米勒 (Ross A. Miller) 就曾質疑英高赫所構建的「後物質主義」概念自身並沒有形成一個所謂內部一致的文化聚合<sup>⑩</sup>。然而，這恰好符合香港農業群體身份多元、各自表述這一特點。問題在於這種內部沒有統一框架的論述如何能建構一種新的主體性？斯科克波 (Theda Skocpol) 早已提醒我們不能帶着目的論來看待集體行動——即認為人們必然會在舊有的意識形態 (如新自由主義) 的價值觀失去效力時，有意識、有目的地重建另一種時代共識，而應該看到多種不同的社會力量有意無意地發生了所謂的「接合」<sup>⑪</sup>，在各自表述中推動新價值觀念的傳播。

而反霸權論述的傳播需要部分覺醒者率先建構新的主體論述，即如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所言那般，讓那些「無分之人」(who have no part) 重新進入公眾視野，「連結或者切斷現存的經驗構序中不同的領域、地區、身份、職能以及能力」<sup>⑫</sup>。換言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需要打破並重建經驗認知的組合，但這僅僅是在判斷或者推理層面的理論建構。為了闡釋在經驗傳播

的過程中，持有不同表述的差異個體如何取得共同的感受從而實現聯動，本研究亦參考了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提出的以形象訴諸肉身的方案，審視文本的形象元素潛在的創造身體感性體驗的能力。換言之，本文除了從理性層面考察論述的運作邏輯，亦關注視覺形象創造出來的、直接作用於身體的情感體驗，反思其帶來的強烈的在場感或者共感<sup>⑤</sup>。實際上，就有學者在研究香港青年的後物質主義實踐時指出「情感」(emotion) 或者「情動」(affect) 在論述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sup>⑥</sup>。簡而言之，後物質主義主體的論述不僅牽涉到各種論述要素之間如何形成新的規則和新的解釋，亦觸及這些要素如何通過情感進行連結。

## 二 研究方法與問題

### (一) 資料來源與方法

本文分析的香港中文報刊資料出自「慧科新聞資料庫」。為了對比不同年份的論述變遷，本研究以「香港農業」為關鍵字，查閱了自199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相關報刊文章。初步的搜索結果得到了1,162份報導。整體瀏覽這些報導後，筆者清除了僅僅談及飼養豬、雞、魚方面問題的條目和將「香港農業」作為機構名稱使用的報導，最後得到645份相關度較高的報刊報導。

此外，本文的分析素材並不局限於文字媒體，還包括電視節目等其他媒體文本。影視類的媒體文本綜合了視覺與聽覺等元素，比起要求知性層面理解的文字內容，更直接地在感性層面傳遞信息、表達立場。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參考的電視節目資料主要出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提供的視聽類電子資源<sup>⑦</sup>。具體而言，以「農業」為關鍵字，以「本地電視節目」為搜索條件，結果顯示館藏的相關資源中最早的節目始於1982年10月3日。筆者進一步將搜索的區間劃為1982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結果得到347集電視節目。筆者瀏覽了每個條目附帶的文字概述後，首先篩除了與香港農業無關的節目。接着，通過初步的觀看，剔除了僅僅談及飼養豬、雞、魚方面議題的電視節目內容，以及那些與農產品、農地或者農民議題無關，只是因為內容涉及可持續發展(如新能源開發、保護動物、珍惜資源)和土地用途(如公共房屋)而被系統識別為與農業相關的條目。最後，得到105集用以分析的電視節目內容。這些節目主要由三家不同的機構製作，分別是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香港電台、商業機構的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sup>⑧</sup>。

在主流媒體以外，筆者亦以非系統的方式跟蹤另類媒體和網絡媒體對香港農業的報導，同時參考與香港農業相關的電影或紀錄片資料，包括獨立紀錄片《收割，開路！》(2015)和《鐵怒沿線》(2016)，以及商業電影《竊聽風雲3》等，並且採訪了《收割，開路！》的導演。此外，本研究查閱了香港漁農自然護

理署(前稱「漁農處」)自1951年以來的年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2001年以前的資料,2001年後的資料可於官方網站查閱)和該部門委託廠商完成的諮詢報告、蔬菜統營處官方網站公開的年報和周年特輯、規劃署官方網站關於農地的資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官方網站關於社區園圃的資料,以及立法會官方網站關於農業、農地和農民議題的資料等,以便更準確地了解香港農業的發展歷史<sup>⑤4</sup>。

在論述分析的具體路徑上,本研究主要參照了社會學家甘遜(William A. Gamson)和他的合作者的分析方法。具體來說,本文假設認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人與支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運用不同的論述規則闡釋他們的日常經驗,相應地,這些論述規則建構了表達其立場的「論述包」(package)<sup>⑤5</sup>。甘遜等人一般通過廣泛閱讀特定議題的媒體文本,識別這些文本所採用的架構策略,譬如隱喻、典範、標語、描寫和視覺圖像<sup>⑤6</sup>,並且進一步分析特定論述所構連的權力關係或者意識形態。一方面,和費爾克洛夫等人的分析路徑相似<sup>⑤7</sup>,甘遜等人採用的論述分析方法關注修辭的策略;另一方面,他們對文本進行基本的量化考察,例如某個用詞的頻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以往批評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由於缺乏系統的語言證據而衍生解釋片面的問題<sup>⑤8</sup>;而這一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夠展現分析的深度,潘忠黨認為在於其要求研究者「對議題及其相關的社會行動者做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詳盡考察,以此建立研究者解構文本所必須的知識背景」<sup>⑤9</sup>。

本文對香港社會語境的解讀離不開筆者在2015到2017年間(主要集中在2015到2016年)進行的田野考察,以及與農業群體中多位相關行動者進行訪談所積累的知識背景。正是基於這些前期的考察並且結合已有的更廣泛意義的香港社會研究的文獻,提出了香港社會出現後物質主義轉向的假說。接下來的研究分析將通過反覆閱讀農業議題的媒體文本,識別文本中所採用的架構策略,對分別代表新自由主義和後物質主義論述包的元素進行量化的考察,並且進一步考察媒體論述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研究在媒體文本分析過程中借用了甘遜等人的闡釋方法,但是論述包這個分析工具本身假定了連貫組織的論述框架,即透過框架整合論述包中的諸要素,而忽視了各要素之間的矛盾,而這一假設對於反霸權的論述而言未必成立,畢竟反霸權的論述背後有着諸多缺乏統一組織的「個人行動框架」<sup>⑥0</sup>,而且存在偶然的論述接合。

## (二) 研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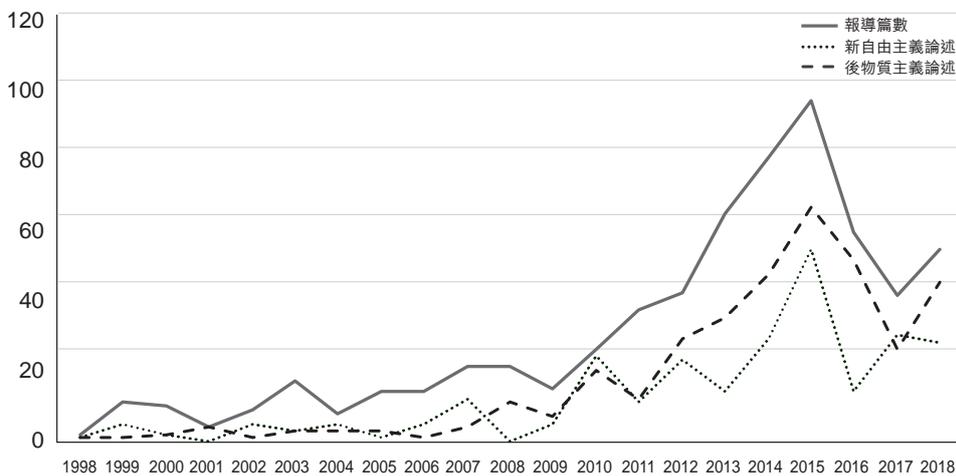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探討上世紀80年代以降香港主流媒體在論述香港農業空間時呈現的集體主體性,以及媒體的論述運作與香港整體的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本文圍繞以下問題展開分析與討論:一、主流媒體是否呈現了香港社會的新自由主義價值和後物質主義價值?二、如是,這些媒體文本具體運用了怎樣的架構策略?三、不同的論述包之間是否存在角力關係?四、農業論述對於香港這一都市社會的意義是甚麼?換言之,這些論述

本身揭示了香港社會怎樣的現實境況？前三個問題將會在接下來的媒體文本分析部分進行回應，最後的問題將在結語一節進行討論。

### 三 主流媒體的香港農業論述概況

為了對主流媒體視野中的香港農業論述有大致的了解，本研究首先對篩選出來的645份報刊資料按照刊出的年份和篇數進行統計。從圖1可以清楚看到，2010年後香港農業論述顯著增長，並且在2015年達到了頂峰。2010年恰恰是菜園村事件後兩個提倡香港農業保育的團體「生活館」和「馬寶寶社區農場」相繼成立的年份。而出現最高值的2015年亦與香港政府推出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2014年12月29日發表，諮詢期至2015年3月31日）的時間大致重疊。考慮到菜園村事件的部分參與者擁有參與城市保育運動的經驗，這一論述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帶有明顯後物質主義色彩的保育運動延伸到香港的農業空間。而2015年的峰值表明新農業政策對社會變化作出了回應以及公共論述對政策變化亦作出了反饋，即2014年12月政府公布政策諮詢文件後，政治傾向不同的媒體，如《文匯報》、《信報》、《明報》以及《蘋果日報》等報章均對新農業政策發表論見，這也就表明了香港農業不再被擱置於歷史記憶的角落中，也不再局限於小圈子的生活實驗，而是被提上了公共議程。

圖1 香港農業論述報導篇數、兩類論述的趨勢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筆者反覆閱讀媒體文本後，嘗試抽取兩組措辭作為新自由主義和後物質主義論述包的架構元素，並對此進行量化的考察。「效益」和「生意」是新自由主義價值的「經濟人」的常見表達。相對而言，指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修辭則比較分散多樣。雖然民間的農業團體不乏提倡「社區農業」，但是「社區」字眼亦常常用於「社區中心」、「社區組織」乃至「社區大學」這樣的搭配。為此，本研究採納「保育」一詞為分析對象，同時將保育運動中常見的情感修辭「快樂」

作為另一個參考對象進行統計。不過，筆者發現有些報導站在否定的立場談論新自由主義或者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例如，有文章斥責「香港的城市發展往往只注重經濟效益，忽略居民的訴求和需要，肆意清拆破壞有價值的老街老店」<sup>⑩</sup>，而其中的老店就包括在市區內經營的菜種行；又如地產界人士施永青亦發文，直言「香港是不應該為了保育農業，而放棄在新界發展新市鎮的」<sup>⑪</sup>。為此，本文進一步以 (P) 表示該詞與其所屬的論述包立場基本一致，以 (N) 表示該詞與其所屬的論述包立場不一致，而計算總和的時候只看用詞歸為 (P) 類的頻數，從而更準確地計算不同論述包要素的出現頻率。此外，根據已有的文獻，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強調有人情味的社區，而且在香港的語境中，地產霸權理應成為其中一個反抗對象。因此，本研究將「人情味」和「地產霸權」作為額外的參照對象進行統計。

表1 香港農業論述的用詞及其頻率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報導篇數	2	11	10	4	9	17	8	14	14	21	21	15	26	37	42	64	80	96	59	41	54
效益 (P)	1	2	2	0	0	0	0	0	1	5	0	2	4	0	5	2	9	17	7	10	14
效益 (N)	0	0	0	0	3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生意 (P)	0	3	0	0	5	3	5	1	4	7	0	3	20	11	18	12	20	37	7	20	14
生意 (N)	0	0	0	0	0	0	0	1	0	4	0	1	0	0	0	0	0	0	0	0	0
新自由主義論述	1	5	2	0	5	3	5	1	5	12	0	5	24	11	23	14	29	54	14	30	28
保育 (P)	1	1	2	4	1	3	3	3	1	3	11	6	17	8	25	25	35	64	51	22	42
保育 (N)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快樂 (P)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3	4	4	10	12	2	0	4	3
快樂 (N)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後物質主義論述	1	1	2	4	1	3	3	3	1	4	11	7	20	12	29	35	47	66	51	26	45
地產霸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1	4	2	1	0	0	2
人情味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4	3	0	7	6	2	8	0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表1可以看到，「保育」字眼在1998到2018年間從未缺席，而從早期「保育」字眼與「水土」、「自然」等詞語搭配使用可以看出，這很可能與環保論述早在香港扎根有關<sup>⑫</sup>。不過，我們依然可以清楚看到2010年前後「保育」字眼出現明顯的增長並且出現了「保育農業」、「保育人士」、「保育運動」等詞語；而「快樂」字眼在2009年前甚至不跟農業論述有關聯，但是在這之後亦開始零星出現。同理，「人情味」和「地產霸權」雖然出現頻率不高，但是亦主要分布在2010年後的報導中。整體來看，2010年後，以「保育」和「快樂」為代表的後物質主義論述包，在量化層面上整體超越了以「效益」和「生意」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包。這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關於香港農業的媒體論述出現了後物質主義的轉向。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論述包也在2010年後出現了增長。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可能是隨着媒體日益關注本土農業，作為一門產業的農業，其發展狀況也就愈多機會被探討。這也表明了兩個論述包之間存在競爭關係，而不是隨着後物質主義的轉向，新自由主義論述就全然消失。

## 四 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與中產文化的規訓

### (一)「自我企業家」

在2010年前，採納新自由主義論述包的媒體報導大抵把農業歸於經濟生產類別，其重心離不開盈利的問題；農夫的形象亦只區分為傳統農業領域中專注於直接生產的農夫和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綠色生活需求的所謂「現代農夫」。例如，在香港農業明顯式微而新的生產類型尚未冒起的時候，農業生產被香港主流媒體形容為不合時宜的事物，「以現代的眼光看來，往日農村社會的一切都已經落伍」（《百載鑪峯》，香港電台，1982年10月3日）。但是到了1990年代前後，香港農夫赴中國內地經營農場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趨勢，而且有機耕作方式亦得到新興中產階級群體的青睞和政府的推廣<sup>64</sup>。對此，媒體論述將所謂的「北上」和「有機」的農業納入到香港的商業發展邏輯中，將它們描述為有利可圖的商機。

在這一過程中，主流媒體選擇了一批更符合「現代農夫」形象的對象進行報導（《再造的空間》，香港電台，1993年2月20日；《新聞透視》，無線電視，2003年1月6日），遮蔽了一大批多年來從事耕作的傳統農夫。譬如在電視節目論述中，農夫不再是默默耕耘的體力勞動者，而是具備所謂「經濟素質」和商業技能的經營者，有着勤於工作、善於經營、提升自我（創新）等品質。香港電台的一集節目曾以「現代農夫」為主題採訪了北上開農場的香港農夫，其描述更是盡顯新自由主義的「自我企業家」論調：「對新一代農民來說，耕種不再單靠辛勤勞動，還要有生意頭腦、企業化的眼光和人事管理的能力」，並且最後總結道，「相信憑着農民的勤奮幹勁，不斷在耕地上的摸索創新，為香港農業帶來一個新的路向」（《香港盤旋》，香港電台，1990年7月11日）。無線電視一集財經節目亦坦承「經濟能夠負擔的中產階級，是農莊主攻的市場」，而且認為相應地，農夫應該了解這一自由經濟市場需求而做出策略調整，「新派的有機農夫認為不能依靠政府開拓新市場，於是推廣和分銷有機蔬菜全部自己負責」（《財經透視》，無線電視，2004年7月4日）。此外，新型的「現代農夫」也被打造成洞悉高檔餐廳食材偏好、有品牌意識的商人形象，或者是懂得用電腦科技處理訂單的專業人士形象（《新聞透視》，2011年6月11日）。

### (二)中產階級的綠色生活實踐

雖然主流媒體有關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有機農業的報導主要突出其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以及與自然直接接觸的屬性，但是這些媒體論述更多只是在塑造「生態企業家」，即將健康和綠色生活方式視為一種資本形式，在不創造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或者在不否定資本主義霸權的前提下，將有機耕作描述為一種符合新興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綠色生活實踐。例如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展示了有機種植同好者用悉心培育出來的植物做「生機壽司」，並且到市中心的公園參與環保活動，期間他們亮出了用英文書寫的橫幅——“We're linked

to build a greener Hong Kong”，整個畫面區別於傳統耕作的體力勞動場景，而且同好者群體明顯是具有一定文化和經濟資本的中產階級（《再造的空間》，1993年2月20日）。這一節目與其說將有機種植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不如說作為一種中產階級生活實踐。

儘管2010年以來體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論述崛起，類似的論述亦時有出現，只是所談之物由司空見慣的有機產品轉為更有噱頭的「水耕菜」，用「科技」和「隔絕不淨物」的修辭來進一步包裝綠色經濟的論述（《原來錢作怪》，香港電台，2013年7月6日），但這種強調綠色生活和健康的論述只停留在個體生活層面，並沒有與更具公共性質取向的環境保護論述構連起來。因此，同樣在上述有關「現代農夫」這一集電視節目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當節目主持人在前往農場的路上看到周遭的貨櫃時，竟然毫無反諷之意地說出：「這個貨櫃真是和農田相映成趣」，沒有追究背後的环境問題；而農夫亦被塑造為更有意識地追求生活素質的人，譬如鏡頭中的農夫形象可以是穿着乾淨白襯衫、為擁有自主決定作息和勞動節奏權利而感到滿意的中年人（《香港盤旋》，1990年7月11日），或者是傾聽鳥鳴、感受自然和諧、享受耕種的自然之友（*The Gastronomes*，香港電台，2000年10月27日）。考慮到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推廣郊野公園計劃以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生活壓力<sup>66</sup>，自然作為賞景運動的對象納入這些年代興起的中產階級生活想像，這些媒體論述突出農耕與自然的關係，事實上更符合中產階級文化對所謂「現代農夫」的期待。但是主流媒體所呈現的這些經驗感受都是私人性的，沒有創建接點以連結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具有「複多性」的人<sup>66</sup>，其實難以激起更多的公共討論。因此，這些論述更多被動地受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和香港中產階級文化圖景的影響，而非積極參與另類主體的論述建構。

值得一提的是，當電視節目中出現的被訪者經驗與新自由主義論述脫節的時候，主流媒體就試圖把論述拉回理性選擇的視角。2001年，香港電台採訪了一位在本地大學資訊系統專業畢業後選擇全職經營農場的青年，主持人使用「傻」和「捱窮」等措辭來追問對方為何放棄理應高薪的專業，似乎「環保」和「體驗大自然與人的關係」還不足以使得務農的選擇顯得合理。這一節目選擇在片頭配上有史詩般氣勢的背景音樂以營造一種「例外」的莊嚴感，並且在結尾配上民謠《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賦予故事以鄉愁情緒和田園想像（《我有我方向》，香港電台，2001年2月18日），似乎要淡化這一被訪者的經驗對中產階級論述規則的否定。事實上，到了2007年，面對選擇放棄城市工作、成為農夫的大學生，媒體論述仍然離不開能否掙錢的問題，例如記者的切入問題依舊是「香港的農夫能否掙到錢」（《香港風華·柒拾3行》，亞洲電視，2007年2月11日）。有趣的是，香港電台在2010年再次找到了2001年節目中選擇務農的這位大學生，而這一回他對農業的堅持似乎得到了認可，被形容為「太陽下追求夢想的人」（《樂活自由人》，香港電台，2010年8月19日），這在很大程度上論證了以下會談到的媒體論述的後物質主義轉向——從確認現實秩序到尊重理想主義。

## 五 後物質主義論述轉向：在地、情動與想像

### (一) 公共、異質的「地方」

在菜園村事件之前，主流媒體中的農業論述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一方面，休閒性質的農場跟隨着後工業社會的步伐到來<sup>⑦</sup>，但是這類以服務業經營模式運作的農場亦存在爭議——商業追求畢竟與受環保論述影響的生態教育理念存在衝突，而主流媒體亦將這種矛盾悉數呈現，例如亞洲電視的一個節目曾經以大埔嘉道理農場的自然教育活動與元朗的假日農莊對比，指出缺乏充足資金支持的假日農莊只能依靠商業模式運營，而在滿足城市的消費群體過程中不免與保留鄉村特色的理念產生衝突（《香港風華》，2005年5月22日）。2007年，由於食物安全問題成為一個社會輿論的焦點，有主流媒體把鏡頭轉向了由社區婦女組織「綠色女流」推動的以「共同購買」為名的綠色消費行動（《時事追擊》，亞洲電視，2007年3月31日）。與之前局限於個人健康層面的中產階級生活論調不同，所謂的「共同購買」濫觴於1960、70年代歐美和日本的反主流文化，強調社區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因而將農業與消費正義這一公共議題接合起來<sup>⑧</sup>。

但更為重要的是，以保衛天星碼頭行動為標誌的城市保育運動，形成了一套現已被社區工作者廣泛使用的「地方創生」/「地方營造」(place-making) 論述，強調「地方」所凝聚的價值和情感、突出在地生活經驗和故事、反對資本主義權力關係下抽象的空間發展規劃<sup>⑨</sup>。主流媒體呈現的農業空間，首先充分展現了這種強調生活與故事的地方形象。譬如香港電台以「鐵路修到菜園村」為主題的節目展現了村民相聚在有暖黃燈光的小屋裏，一起有說有笑地吃晚飯，然後以這個場景為背景畫面，插入了村民往昔的老照片——其中包括小孩子在菜地邊上快樂揮手的情景，並且當背景歌曲唱到「沒有家多麼坎坷」時，畫面轉向了被煙霧圍繞的城市建築（《鏗鏘集》，香港電台，2009年4月6日）。這樣一來，通過場面調度和配樂的運用，這一節目營造了與城市不同、富有人情味的鄉村生活經驗。

如果說，藉由非原居民之口表達的更多是局限於特定人群的「家」和「根」的感情，那麼正是背景各異的外來參與者的聲音，推動香港的農業論述與更多公共議題接合起來，並且連結了香港社會中具有「複多性」的人。譬如主流媒體通過採訪支援本地農業的人士，明確將「本土」的概念範疇從相對封閉的社區含義擴展到公共事務的層面，賦予「本土生產」的食物以反對資本主義霸權的象徵意義（*Metropolitan Consumer*，香港電台，2015年7月22日）。除了「地方創生」這一焦點以外，英高赫所說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譬如要求對社區工作有更多發言權、在城市與自然關係問題上保持平衡等亦在主流媒體上得到呈現<sup>⑩</sup>。主流媒體除了如實引述「還地於農，不要假諮詢」的口號，還多次肯定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關的「城鄉共生」方案，譬如通過專家之口道出「香港有一種全球都非常欣賞的發展模式就是城鄉郊並存共融」（《鏗鏘集》，2012年11月12日）。隨着涉及不同人士利益的土地用途問題的發酵，尖銳的公共討論

成了媒體論述的一大焦點。譬如香港電台的時事辯論節目就邀請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議員以及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成員同場討論，展現各方力量的論述衝突（《城市論壇》，香港電台，2012年9月23日）；又如無線電視就其新聞紀實節目邀請代表不同立場的個人，包括要求檢討新界原居民丁權制度的土地正義聯盟和原居民代表發表意見，展現土地擁有權的爭議（《新聞透視》，2016年2月17日）。

媒體論述中的農業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洪席耶的理論，即其展現了連結不同的人的能力：且不說另類媒體，主流媒體的論述場域已經呈現了一個充滿異質性的空間——原本甚少被提及的「非原居民」村民<sup>①</sup>，成了被看得見的「無分之人」；各色各樣的城市人除了來新界農村耕種之外（《香港本色》，無線電視，2015年4月12日），還會參與導賞（《鏗鏘集》，2010年7月18日）甚至是音樂會（《藝坊星期天》，香港電台，2010年11月21日）。單就媒體論述呈現的畫面而言，農業空間不再僅僅是封閉的生產空間，而是不同的人聚集、相遇的多功能空間，體現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說的「空間的流動化」<sup>②</sup>。可以說，正是通過展現農業空間的流動性和公共性，我們看到了一種集體的主體性正在生成——彼此差異的成員打破了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的條條框框，將後物質主義的不同價值落實到生活層面。

## （二）稻米與情動的連結

被不同立場的電視、報刊和網絡媒體多次提及的「港米」無疑是香港農業論述中最能錨定多方議論的「有生氣之物」<sup>③</sup>。早在1986年，香港政府漁農處的年報關於稻作的記錄就已為零<sup>④</sup>，昔日著名的元朗絲苗米亦已絕迹，圍繞稻作復興的報導所激發的地方情感，有着強烈的在場感。根據2017年的報導，香港只有八個地方復耕稻米<sup>⑤</sup>。雖然從供應層面來看，這些小農場的產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媒體論述卻給予稻米種植格外顯著的曝光頻率。

最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香港電台以「種米·種情」為題，展現了不同社會背景的個體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共同為種植稻米作出貢獻：戴着白色頭巾、打着耳釘的嬉皮士形象的青年農夫，數年來留守農村種菜之餘又種米，講述種植讓他感受到的不可言喻的自由感；元朗屏山鄧氏宗族的後人用傳統的雞公碗盛飯，追憶昔日家中元朗絲苗米的種植經歷；屬於上世紀戰後「難民農夫」一代的老農民說起為了報答昔日老漁民的一飯之恩決定復耕稻米，並感謝一群青年義工來到田裏幫忙收割；德國留學回來的女生毅然當起見習農夫並且發起稻米秋收祭，在音樂和舞蹈中舉行儀式，向大地表達感恩之情。通過鏡頭的剪輯，有着不同生活經驗的個體實現了視覺上的連結，拼湊了一個無利可圖的後物質主義奇觀。而且這個節目展示人們的笑臉以及彼此擁抱的鏡頭，渲染互助友愛的氛圍，並調用豐富的電影語言以喚起觀眾的情緒，如節目一開始就特寫稻粒，配以富有穿透力的民歌為背景音樂，並且從特寫到遠景到航拍不斷拉遠鏡頭，營造了一種地方傳奇感。值得注意的是，節目最後的總結肯定了青年務農體現的後物質主義價值：「以前的農夫種田是為了生存，年

輕人重返田園生活為了自由、自主，因為種田，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本土歸屬。」（《香港故事—本土plus+》，香港電台，2016年12月3日）換言之，在主流媒體論述中，「稻米」不再是被理性計算的經濟產物，而是承載了典型後物質主義價值的物質，連結了異質的個體，成了激發共同感情的錨點。

然而，這是否意味着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就主導了主流媒體？事實上，主流媒體的論述之所以肯定本地農業，更多在於這種實踐所體現的後物質主義價值，一旦回到農業的生產消費問題，主流媒體亦時會質疑或者重申經濟理性。譬如香港電台曾經邀請一位文化人與一位參與農業復興的青年對話，身為文化人的嘉賓就質疑高價的本地產品是否販賣同情（《地厚天高》，香港電台，2012年4月30日）。換言之，主流論述意識到後物質主義的實踐可能有道德資本主義之嫌。而早在1980年代末大力推動香港有機耕作的環保人士周兆祥也在電視節目上重申，沒有消費能力就難以在香港選擇本地食材（《新聞透視》，2013年8月24日）。

### （三）主體的想像

除了紀實類的節目之外，香港的主流媒體近年來亦通過想像性論述談及農業議題<sup>⑥</sup>，即在其虛構的影視內容中將鄉村和農業問題作為主題背景或者聚焦點。這一類型的媒體論述不僅可以調用創造性敘事，而且可以更靈活地運用各種視聽語言，以更生動的手段來投射論述生產者對農業議題的想像。譬如香港電台一套單元劇曾以「原野春夢」為題，講述一位外號叫「肥狗」的青年耕作人如何影響一位化濃妝、戴粉色假髮的時髦女生對農業的看法（《有倉出租》，香港電台，2016年11月21日）。劇中肥狗被賦予了一種打破邊界傾向的「遊牧」<sup>⑦</sup>主體性：本是新界宗族後代的他，從台灣學習耕種歸來後發現自己的田地和丁權都被父親賣掉，而且被村民以為誤入黑道，最後在香港四處租田無果，帶着村民送他的「東北豆角」的「死剩種」遠走印度耕種。整個故事與現實的鄉村問題相呼應，構成互文性，比如失地的問題象徵着鄉村傳統被資本闖割，而「東北豆角」暗示的是新界東北的規劃方案對農業帶來的破壞，因而其種子被無奈地戲謔為「死剩種」（在粵語中本是粗俗的咒罵用語）。同時，肥狗又如「認知上的不穩定無產者」（cognitive precariat）<sup>⑧</sup>，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意志，能割斷與其身處的父權社會的聯繫，將自己與世界公民的身份進行接合，但是就如他戲說自己是「難民」一樣，他無法落地生根，只能繼續面對新的不確定性，暗示了現實環境對其主體欲望實現的限制。

這種不穩定的論述亦出現在紀實節目的論述中，譬如無線電視曾以「半途出家做農夫」為題採訪了一位有大學學歷的青年農夫，他笑言「其實現在這個年代沒有哪份工作是穩定的，就好像有些電視台已經差不多啟播，突然間又無法開台」<sup>⑨</sup>，折射了置身於不穩定經濟社會環境中的主體（《星期日檔案》，無線電視，2015年4月12日）。

總體來看，2010年以前，香港主流媒體大抵將農業視為一門生意或者服務於中產階級利益的實踐。但是菜園村事件以後，主流媒體日漸給予另類價

值觀以發聲的空間。這亦回應了英高赫的說法，即主流媒體並不是一味偏向主流的價值觀念，也會傳播另類的生活觀念<sup>⑩</sup>。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種變化看作香港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價值從城市社區延伸至農業空間，而菜園村事件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傳播契機。更重要的是，主流媒體關於農業空間的後物質主義論述，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日益豐富。媒體論述對現有新自由主義空間規劃的明確質疑，以及對「地方創生」、「城鄉共生」的社會構想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然體現後物質主義價值的另類主體論述挑戰了新自由主義治理所建構的「自我企業家」主體論述。

## 六 另類媒體與受眾回應

不同於主流媒體對農業空間進行景觀式呈現，不少另類媒體論述突出自身與農業群體的協作性質，試圖建構一幅共同參與的空間圖景，並且兼備了訴諸身體的情感敘事和推理判斷性質的分析。譬如獨立紀錄片《鐵怒沿線》和《收割，開路！》皆呈現了受城市發展規劃影響的新界鄉村情景，如前者以菜園村事件為主線，後者以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為背景。然而，更重要的是，兩部影片在敘事之外，都記錄了村民、農夫瑣碎的日常生活節奏，並且皆展示了外來的青年志願者或者拍攝者本人與村民的對話以及互動，營造了一種共同的在場感。值得注意的是，另類媒體論述並不僅僅聚焦「地方創生」的說法，它亦成為一個論述建構的平台，允許農業群體在列斐伏爾所言的「構想」層面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問題上<sup>⑪</sup>，嘗試正面挑戰新自由主義那套從屬於經濟發展邏輯的空間權力關係，如通過《立場新聞》和《獨立媒體》等網絡另類媒體，講述農業政策、規章和本地農業的發展軌迹等<sup>⑫</sup>，或者通過如《種植香港》雜誌和《水耕透視：香港水耕產業研究》這樣的獨立出版物，結合文獻、田野考察和問卷調查等方式來闡述香港農業問題。支援農業的參與者常常是主流媒體報導農業議題時的被訪對象，而當主流報導出現偏頗時，另類媒體亦成為這些行動者對主流媒體報導進行補充或者反駁的重要場域<sup>⑬</sup>。

不過，有意思的是，另類媒體亦沒有完全排斥「自我企業家」形象的農夫在其論述場域的出現。譬如一位受過良好教育且曾做過經理的新型「現代農夫」也成了《收割，開路！》的主角之一。這位農夫善於經營自身形象，除了為奪得「綠星級環保大獎」拍攝宣傳片，還積極參與農業團體組織的活動。不過，正是通過展示這樣一位毋庸置疑符合「自我企業家」形象的農夫的處境，該影片導演陳浩倫更深刻地表明了香港政治經濟結構對農業的打擊，「他很想走出那個世界，將農業帶到一些地方。但是一個這樣的人都容不下，一個這樣圓滑的人都容不下。即是那種親疏有別的政治文化就令這種想認真、商業性地做農業的人都撐不住」<sup>⑭</sup>。

至於受眾對媒體論述的接受程度，就如霍爾(Stuart Hall)所言，受眾對媒體信息的解讀受制於自身的知識架構、身處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的技術配置<sup>⑮</sup>。筆者通過訪談發現，不乏有投身農業保育陣營的參與者一開始受到媒體有關

後物質主義傾向的農業論述影響，產生共鳴或好奇心<sup>⑥</sup>；亦有年輕人一方面通過媒體接觸到本土農業議題，乃至曾經到訪受發展規劃影響的新界鄉村，認同農業作為一種多元生活方式或者一種反對資本主義霸權的方式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認為該議題始終並不迫切，自身並不會因此作出改變<sup>⑦</sup>，以及考慮到社會的經濟構成，對農業復興的可能性始終抱有狐疑態度<sup>⑧</sup>；也有身為原居民的青年人認為媒體往往把原居民呈現為只顧自己利益的形象，因被片面「代表」而感到尷尬<sup>⑨</sup>。儘管這些受眾的解讀不一，對生產關係的變革亦未有一致的樂觀展望，然而，他們對農業自身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體現了媒體論述對社會想像的改變。

## 七 結語

從整體社會變遷來看，香港農業青年的實踐可被視為後工業時代追求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新社會運動或者反霸權行動。要在一個土地資源配置問題備受關注、新自由主義論述早已扎根的大都會中打破主流的城鄉關係、生計及生活方式認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業群體必須直面的要務。大眾媒體不僅記錄、折射社會的變遷，更是各方社會力量建構、傳播自身理念的場域，亦即意味着農業群體需要在媒體中爭取到其「現身」(presence)的空間<sup>⑩</sup>。為了了解香港社會輿論中對農業空間的認知和想像，以及這種認知和想像與農業群體的行動的關係，跟以往研究將重點放在具體的農業實踐上不同，本研究聚焦於主流及另類媒體對農業空間的論述。上述研究發現，就論述層面而言，主流意識形態對農業的認知與想像實際上出現了轉變——儘管強調經濟效益的新自由主義論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延續至今並未消退，90年代以來興起的綠色生活論述亦更多被納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想像，但是大約在2010年後，城市保育運動延伸至農業空間，反對發展主義以及強調地方情感的論述增強，而且這種抗衡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論述與更多樣的社會議題接合，如土地擁有權等。固然，另類媒體是農業群體正面闡發自身立場、挑戰現有霸權體制的主要障地，但主流媒體亦給予這些反霸權論述一定的傳播空間。

然而，這一研究發現目前僅僅局限於香港農業的領域，這很有可能表明了農業在整體上被置於香港社會的生產領域之外，只是作為一種小規模、反主流的亞文化。與此同時，儘管符合新自由主義價值的中產階級主體論述在2010年後相對讓位給後物質主義的主體論述，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產階級文化的區分標準自身也是變動的。實際上，近年來媒體論述的情感化敘事與影像風格也在很大程度體現了香港中產文化價值和審美的變化，而這是以經濟生產領域沒有受到顯著挑戰為前提的。此外，媒體論述呈現出來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念內部是多元異質的，也表明了不同於傳統的農民學，香港的案例呈現了一個內部異質的農業群體，而且其農業空間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列斐伏爾所言的流動性。然而，懷舊、消費正義、社區/地方創生、自由價值、感恩等元素內部能否形成一個一致的框架是讓人懷疑的。不過，後物質

主義論述內部沒有達成共識，是否意味着它就不具有抗衡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的能力呢？那也不盡然。已有的研究文獻亦表明了後物質主義觀念的變遷涉及一代人的「感覺結構」的變化，若然後物質主義價值在代際之間、在不同領域之間繼續延展，那麼它與佔據着霸權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價值之間的張力關係亦會隨之改變。這一問題需要未來長期的觀察與實證分析，在此不再展開討論。

### 註釋

① James Hayes,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71-84.

② 參見〈香港的農業〉，漁農自然護理署網，[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hk/agr\\_hk.html](http://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hk/agr_hk.html)。

③④ 藍逸之：〈一個新自由城市、兩種都市政權？1997後香港都市治理的空間爭議〉，《城市學學刊》，第4卷第1期（2013年3月），頁87-139；102-105。

④ 梁啟智：〈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新界想像〉，載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主編：《香港·城市·想像》（香港：匯智出版，2014），頁76。

⑤ 「菜園村事件」始於2008年12月，持續到2011年2月，起因是位於香港新界北的菜園村因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遭受遷拆。當時有很多表演者、「80後」青年和受影響的村民一起爭取保留該村，而事件的結果是菜園村整體搬遷重建。

⑥ 「中環價值」在香港社會語境中指追求發展、財富、效率與全球化的價值觀。這一用語的出處可以追溯至2004年龍應台發表的文章，參見何洵怡：〈論龍應台知性散文對公民教育的意義——以《香港筆記》為例〉，《東華人文學報》，2011年第18期，頁127-60。農業實踐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曾經在另類媒體上發表文章，批判「中環價值」，參見袁易天：〈用新界（東北）規劃香港，而不是中環〉（2014年2月20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21003](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1003)。

⑦ 夏循祥：〈論無權者之權力的生成：香港市區重建的政治社會學考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1），頁213。

⑧ 彭麗君：《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247。

⑨ 「另類媒體」一般指缺少雄厚的商業或政府資金支持、運營方式被認為相對業餘、且其報導理念不再囿於傳統新聞專業精神的媒體，如《立場新聞》。具體定義以及有關香港另類媒體的政治影響，參見Dennis K. K. Leung and Francis L. F. Lee, "Cultivating an Active Online Counterpublic: Examining Usage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 no. 3 (2014): 340-59。

⑩ 參見鄒崇銘、姚松炎：《香港在地農業讀本：追尋生態、適切、低投入、社區農業》（香港：土地教育基金，2015）；本土研究社：《水耕透視：香港水耕產業研究》（香港：本土研究社香港有限公司，2016）；葉子林：《港農，講農》（香港：天地圖書，2018）。

⑪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165。

⑫ 參見蔡晏霖：〈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第22期（2016年3月），頁23-74。

⑬ 參見Darrell G. Moen, "Grassroots-based Organic Foods Distributors, Retailers, and Consumer Cooperatives in Japan: Broadening the Organic Farming Move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32, no. 2 (2000): 55-76。

⑭ 從這一光譜來看，新近投身香港農業的參與者是那些昔日或目前的城市保育運動成員，或者受這些保育團體影響的人。另外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原本爭取農地保育的外來群體乃是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偏向左翼的力量，而隨着香港有關本土意識的爭論日益突出，農業空間亦一度成為爭論的對象。陳允中就指出，2011年後激進右翼一度踏足土地爭議運動，把新界東北發展議題演變為「割地賣港」，與左翼力量產生顯著的理念衝突，而由於隨後特區政府強調新界東北發展的公共房屋興建會讓更多本地人受益，激進右翼轉而離場，改為支持農地的收回。詳見陳允中：〈香港的土地正義運動：保衛家園與保衛國族是不相容的〉，《文化研究》，第18期（2014年春季），頁188-99。事實上，據筆者觀察，激進右翼的想像未見於有關農業或者本地食材的電視節目或者電影中，這也印證了一位保育陣營的被訪者的說法，即激進右翼不會落實去關注農業，而只是「抽水」（粵語俗語，指借題發揮）。參見筆者採訪，2015年11月26日。本研究考慮到對普通參與者以及受眾的信息保護，除了公開諸如影片導演等具有公眾屬性的身份外，其他受訪對象皆匿去其姓名。

⑮ William A. Gamson et al., "M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8 (August 1992): 373-93.

⑯ Terry N. Clark and Seymour M. Lipset,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6, no. 4 (1991): 397-410.

⑰ Alberto Melucci,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 no. 2 (1980): 199-226. 根據這一論說，新社會運動有別於昔日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集體行動，強調行動者對身份認同以及某些價值理念的建構。

⑱⑲ Agnes Shuk-Mei Ku, "Remaking Places and Fashioning an Opposition Discourse: Struggle over the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Queen's Pier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 no. 1 (2012): 5-22.

⑲ Yun-chung Chen and Mirana M. Szeto, "The Forgotten Road of Progressive Localism: New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 no. 3 (2015): 436-53.

⑳ 葉蔭聰、易汶健：〈本土右翼與經濟右翼：由一宗網絡爭議說起〉，載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主編：《香港·社會·角力》（香港：匯智出版，2017），頁80-96。

㉑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㉒ Miira Niska, Hannu T. Vesala, and Kari M. Vesala, "Peasantry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Frames for Farming: Reflections on Farmers' Values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Discourses", *Sociologia Ruralis* 52, no. 4 (2012): 453-69.

㉓ 陳煜禮：〈香港農業合作運動研究——以蔬菜產銷合作社為例（1945-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7），頁199-219。

㉔ Miguel A. Altieri and Victor M. Toledo, "The Agroecologic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escuing Nature, Ensuring Food Sovereignty and Empowering Peasant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 no. 3 (2011): 587-612.

㉕ Edouard Morena, "Constructing a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for the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 The French Confédération Paysanne (CP) as Anti-capitalist 'Peasant' Movement", in *Understanding European Movements: New Social Movements, Global Justice Struggles, Anti-austerity Protest*, ed. Cristina F. Fominaya and Laurence Cox (London: Routledge, 2013), 94-108.

㉖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㉗ Eric J. Hobsbawm, "Peasants and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 no. 1 (1973): 3-22.

㉘ 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解讀媒體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58期（1999年1月），頁89。

- ⑳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2), 8.
- ㉑ Teun A.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 no. 2 (1993): 249-83.
- ㉒ Norman Fairclough,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 ㉓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79*, ed. Michel Senellart,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26.
- ㉔ Alexei Yurchak, "Russian Neoliberal: The Entrepreneurial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rue Careerism'", *The Russian Review* 62, no. 1 (2003): 72-90.
- ㉕㉖ 許寶強：〈差異的社群與互惠的貨幣——反思香港的「社群經濟援助計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0期（2005年12月），頁284。
- ㉗ 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ed. Frederick Gros,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0).
- ㉘ 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倪偉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28-57。
- ㉙ Agnes S. Ku,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 Narrative Cracks and Credibility Crisi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 no. 1 (2001): 121-44.
- ㉚ Ma Ngok,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 51, no. 4 (2011): 683-712.
- ㉛ 參見鄒崇銘：〈搵快錢 vs. 搵慢錢？——生態保育與跨世代公平〉（2015年1月1日），立場新聞網，[thestandnews.com/society/搵快錢-vs-搵慢錢-生態保育與跨世代公平/](http://thestandnews.com/society/搵快錢-vs-搵慢錢-生態保育與跨世代公平/)。
- ㉜ 李立峯、鄧鍵一：〈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載《香港·城市·想像》，頁176-207。
- ㉝㉞ 李立峯：〈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載《香港·社會·角力》，頁47-79；73。
- ㉟㊱㊲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42; 42; 11.
- ㊳㊴ 張少強、崔志暉：《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43。
- ㊵ 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A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no. 3 (1996): 632-59.
- ㊶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3.
- ㊷ 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30-40. 洪席耶在此書中區分了所謂的治安秩序 (police) 和民眾參與的政治 (politics)，前者有等級之分並且強調共識主導的分配政治，而「無分之人」乃是不被算入這一治安秩序中的人。相對地，他認為真正的「政治」會將「無分之人」算入，連結不同身份的人。
- ㊸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著，董強譯：《弗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60-66。
- ㊹ Miranda L. Y. Ma, "Affective Framing and Dramaturgical Actions in Social Move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41, no. 1 (2017): 5-21; Vitrierat Ng and Kin-man Chan, "Emotion Politics: Joyous Resistance in Hong Kong", *China Review* 17, no. 1 (2017): 83-115.

- ② 由於缺乏一個運作穩定以及資料完善的視聽類電子資源查閱系統，本研究難以確保電視節目資料獲取的周全。不過，鑒於本文以報刊資料為基礎對農業論述進行量化層面的分析，而電視節目資料只是作為細緻的文本分析素材，獲取電視節目資料的技術缺陷並沒有妨礙本研究進行考察並得出結論。
- ③ 在最後的篩選結果中，僅在2018年出現了一條由ViuTV製作的內容。這家電視台於2016年4月6日啟播，屬電訊盈科旗下。
- ④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在必要之處援引官方資料以補充說明情況。
- ⑤ William A. Gamson and Kathryn E. Las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ed. Shimon E. Spiro and Ephraim Yuchtman-Ya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397-415; William A. Gamson and Andre Modigliani,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no. 1 (1989): 1-37.
- ⑥ William A. Gamson and Andre Modigliani,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3.
- ⑦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Teun A.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49-83.
- ⑧ Henry G. Widdowson,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no. 3 (1995): 157-72.
- ⑨ 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期（2006年1月），頁32。
- ⑩ 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no. 5 (2012): 739-68.
- ⑪ 霍天雯：〈人情無間在西九〉，《信報財經新聞》，2007年3月1日，P36版。
- ⑫ 施永青：〈新界可發展農業嗎？〉，《am730》，2012年9月27日，A12版。
- ⑬ On Kwok Lai, "Greening of Hong Kong? Forms of Manifest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ed. Stephen Wing Kai Chiu and Tai Lok Lu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9-96.
- ⑭ 香港第一個推行有機耕作的民間組織成立於1988年，漁農自然護理署則在2000年推出「有機耕作轉型計劃」。參見〈有機耕作在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網，[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orgfarm/agr\\_orgfarm.html](http://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orgfarm/agr_orgfarm.html)。
- ⑮ 1965年漁農處委託的諮詢報告已經提出要通過保留鄉郊舒緩社會壓力，具體參見Lee M. Talbot and Martha H. Talbot, *Conservation of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Summary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5)。
- ⑯ 阿倫特的「複多性」概念強調人的差異、多元。在她看來，西方政治思想傳統追求一種合意，並非建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所謂的公共性以及政治應當是建立在具有複多性的人之間的行動之上。參見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在筆者看來，早期媒體論述強調農夫的個體感受，事實上停留在探討其私人領域的經驗，是非政治的。
- ⑰ Ruth Little, Damian Maye, and Brian Ilbery, "Collective Purchase: Moving Local and Organic Foods beyond the Nic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2, no. 8 (2010): 1797-1813.
- ⑱ 新界鄉村的原居民指新界被租借給英國之前在此居住的村民及其後人；非原居民則是後來者，包括那些二戰後以難民身份來到新界向原居民租地種菜為生的人及其後人。參見Christopher A. Airriess, "Governmentality and Power in Politically Contested Space: Refugee Farming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1945-197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1, no. 4 (2005): 763-83。新界

原居民享有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傳統權益，譬如政府的小型屋宇政策僅適用於男性原居民。

⑫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著，劉懷玉等譯：《都市革命》(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 149。

⑬ Loretta Ieng Tak Lou,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Green Living in Hong Kong", *Anthropology Now* 9, no. 1 (2017): 70-79.

⑭ 詳見 Hong Kong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s 1965-9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n.d.)。

⑮ 詳見鄧麗婷：〈港蔬菜自給率 1.7% 跌新低遠遜星洲 全面復耕可達 25%〉(2017 年 10 月 28 日)，香港 01 網，[www.hk01.com/突發/123671/復興港米-港蔬菜自給率 1-7-跌新低遠遜星洲-全面復耕可達 25](http://www.hk01.com/突發/123671/復興港米-港蔬菜自給率 1-7-跌新低遠遜星洲-全面復耕可達 25)。

⑯ 鄉村發展作為關鍵背景出現在這種想像性論述中，還要追溯至 1980 年無線電視播出的連續劇《風雲》。該劇男主角 (任達華飾) 出身新界，並與商人之女 (馮寶兒飾) 結婚，故事背景涉及新界土地買賣與地產發展；《竊聽風雲 3》的片尾曲便是翻唱這部連續劇的主題曲。

⑰ 薛徵：〈解域、脫節與生成：德勒茲電影美學的基本邏輯〉，《文藝爭鳴》，2017 年第 12 期，頁 94-98。

⑱ 這個概念往往指受過良好教育乃至中產階級出身、但是身處一個不穩定的社會與工作環境的人。參見 Keith Bassett, "Rancièrè, Politics,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 no. 5 (2014): 894。

⑲ 此話影射了 2013 年備受爭議的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沒有獲得政府批發免費電視牌照的事件。

⑳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MA: B. Blackwell, 1991), 38-39.

㉑ 例如黃志俊：〈農業園是要建在火星的嗎？〉(2015 年 1 月 5 日)，立場新聞網，<https://thestandnews.com/nature/農業園是要建在火星的嗎/>；土地正義聯盟：〈沒有農地，哪有農業？〉(2015 年 3 月 26 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32746b](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2746b)；葉子林：〈《在地說農》：從農業角度看「土地供應」方案〉(2018 年 5 月 2 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56730](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6730)；長春社：〈社區支持農業〉(2018 年 6 月 25 日)，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57902](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7902)。

㉒ 參見劉海龍：〈與無線對話〉(2018 年 5 月 12 日)，立場新聞網，<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與無線對話/>。

㉓ 筆者採訪，2016 年 3 月 23 日。

㉔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ed. Stuart Hall et al.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120.

㉕ 筆者採訪，2015 年 11 月 26 日；2016 年 1 月 30 日。

㉖ 筆者採訪，2016 年 5 月 8 日；2015 年 9 月 10 日。

㉗ 筆者採訪，2016 年 4 月 13 日。

㉘ 筆者採訪，2016 年 4 月 12 日。

㉙ Myra M. Ferree et al.,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